

青少年八国峰会上的中国留守少年

7月16日,16岁的方治乾离开课堂半个月后,重新坐在了河南省信阳市罗山高中高二(1)班的教室里。

其间,他第一次用上数码相机,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参加高规格的会议,第一次与多国青年交谈……

方治乾是一名农村留守少年,有幸成为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青少年八国峰会(简称“J8峰会”)的4名中国学生之一。

J8峰会被称为“未来领导人的高峰会议”,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2005年发起。它与G8峰会(即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同时举行,探讨相似的话题,并选出代表与G8峰会的国家首脑见面,表达他们的心声。

那么,方治乾是如何被选中?在J8峰会上做了什么?作为留守少年,他与父母又有着怎样的异样生活?

信阳甄选 善于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

今年5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罗山高中接到上级通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以下简称“儿基会”)等机构要来挑选学生参加J8峰会。联合国对儿童的界定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要求年龄14~17岁、农村孩子、父母一方在外面打工、外表阳光、英语成绩相对较好。”罗山高中副校长孙文平说。

先是每班班主任推荐一名优秀学生。然后,孙文平把20多名学生叫到办公室,提出J8峰会相关问题,依回答情况淘汰了一半。接着,校长从中选出了5名学生。3天后,儿基会的合作伙伴——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活动部主任楚锐一行来到罗山。选拔方让5名学生坐在一起谈特长、谈对有关问题的看法,还让唱歌。方治乾不会唱流行歌,他站起来唱的是一首儿歌。对于金融危机给儿童权利带来的影响,他先从“爸妈的活儿没以前多了,收入下降了”说起。选拔方最终认为,方治乾比其他优秀学生更“善于用儿童的眼光看问题”。两天后,方治乾在孙文平的陪护下,前往北京到儿基会面试,结果顺利通过。

为什么要到信阳、要在罗山高中选这个农村学生代表呢?据中国代表团领队、儿基会新闻官刘莉介绍,中国代表团要考虑城市与农村、男与女之间的平衡。孙文平认为,信阳是劳务输出大省的知名劳务输出大市,信阳的鸡公山又是该出版社的定点活动基地。罗山县距信阳市区最近,留守少年多。因此,他们到信阳罗山高中选拔。

罗马首日 饮食成为异国的第一次考验 6月28日,方治乾由班主任王世海陪同到了北京。

中国代表团由北京四中初二学生李梦圆(女)、北京二中高二学生梁晓天、贵州凯里侗族高一学生张颖(女)和方治乾4名青少年组成。7月3日,他们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罗马的飞机。10个多小时后,J8峰会志愿者挥舞着小旗在罗马机场出口迎接了他们。

J8峰会的驻地是罗马的一所高等消防学院。当晚,14国代表团的54名代表被打散安排了宿舍,方治乾和一名德国代表、一名意大利代表住在一起。方治乾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所谓晚餐,其实是两块夹有奶酪和火腿的面包,又凉又硬,这算是我在罗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吧。”

7月4日,J8峰会代表们一起来到罗马斗兽场,参加了“首脑,请听我说”活动。各国青少年代表将建议写在纸上,投入一个巨大的纸耳朵模型后做出呼喊的姿态,希望G8峰会的各国首脑听取儿童的心声。

7月5日,会议正式开始。每天上午9点开始分组讨论,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午饭时间一个小时,然后接着分组讨论,并向与会者做陈述。每个小组都分别来自14个国家的一名代表组成,而且小组成员不固定。

他们讨论的议题与100公里外意大利拉奎拉同期举行的G8峰会类似:儿童权利与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非洲的发展3大议题,后来又通过代表们投票增加了教育议题。

王世海陪同到了北京。中国代表团由北京四中初二学生李梦圆(女)、北京二中高二学生梁晓天、贵州凯里侗族高一学生张颖(女)和方治乾4名青少年组成。7月3日,他们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罗马的飞机。10个多小时后,J8峰会志愿者挥舞着小旗在罗马机场出口迎接了他们。

J8峰会的驻地是罗马的一所高等消防学院。当晚,14国代表团的54名代表被打散安排了宿舍,方治乾和一名德国代表、一名意大利代表住在一起。方治乾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所谓晚餐,其实是两块夹有奶酪和火腿的面包,又凉又硬,这算是我在罗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吧。”

7月4日,J8峰会代表们一起来到罗马斗兽场,参加了“首脑,请听我说”活动。各国青少年代表将建议写在纸上,投入一个巨大的纸耳朵模型后做出呼喊的姿态,希望G8峰会的各国首脑听取儿童的心声。

7月5日,会议正式开始。每天上午9点开始分组讨论,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午饭时间一个小时,然后接着分组讨论,并向与会者做陈述。每个小组都分别来自14个国家的一名代表组成,而且小组成员不固定。

他们讨论的议题与100公里外意大利拉奎拉同期举行的G8峰会类似:儿童权利与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非洲的发展3大议题,后来又通过代表们投票增加了教育议题。

王世海陪同到了北京。中国代表团由北京四中初二学生李梦圆(女)、北京二中高二学生梁晓天、贵州凯里侗族高一学生张颖(女)和方治乾4名青少年组成。7月3日,他们从北京首都机场登上飞往罗马的飞机。10个多小时后,J8峰会志愿者挥舞着小旗在罗马机场出口迎接了他们。

J8峰会的驻地是罗马的一所高等消防学院。当晚,14国代表团的54名代表被打散安排了宿舍,方治乾和一名德国代表、一名意大利代表住在一起。方治乾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所谓晚餐,其实是两块夹有奶酪和火腿的面包,又凉又硬,这算是我在罗马经历的第一次考验吧。”

7月4日,J8峰会代表们一起来到罗马斗兽场,参加了“首脑,请听我说”活动。各国青少年代表将建议写在纸上,投入一个巨大的纸耳朵模型后做出呼喊的姿态,希望G8峰会的各国首脑听取儿童的心声。

7月5日,会议正式开始。每天上午9点开始分组讨论,一直进行到下午1点,中间有20分钟的休息时间。午饭时间一个小时,然后接着分组讨论,并向与会者做陈述。每个小组都分别来自14个国家的一名代表组成,而且小组成员不固定。

他们讨论的议题与100公里外意大利拉奎拉同期举行的G8峰会类似:儿童权利与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非洲的发展3大议题,后来又通过代表们投票增加了教育议题。

平不如他们,他们也比我开朗一些。”

方治乾面对记者时很拘束。孙文平说:“这个孩子在同龄人中很活跃,为了做调查他可以到每个班去演讲。但是,他和成年人沟通时放不开。”

王世海说:“他的英语很棒,学习成绩在全县排前5名。但是,他把全部身心扑在学习上,谈不上有什么特长,在这方面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差距很大。”

不过,方治乾有农村孩子特有的节俭、朴实。出国前一天,他去逛街买衣服,装400元钱的包被人抢走。他在电话里跟妈妈说去买衣服了,“干脆不去算了”。次日上午,妈妈谢奎娥从打工地赶回家带他买衣服。他不愿意买,说“我又不是去搞时装周表演”。谢奎娥开导他说:“本来外国人就觉得中国人穷,你穿旧衣服,影响中国形象。”

于是,方治乾买了一套衣服,包括短袖衬衣、裤子和凉鞋,但加起来还不到60元。

在北京,王世海老师塞给他700元,最后方治乾只接了400元。他没有兑换成欧元,十几天这笔钱仍一分不少。

儿基会代表团每名成员发了100欧元。方治乾花20欧元买了一本英文原著,又退回50欧元左右捐给拉奎拉的地震灾区。出国前,罗山县常务副县长周哲送他一台数码相机,他不伸手接也不表示感谢。孙文平很生气,后来方治乾告诉他“嫌太贵重不想要”。

7月16日,方治乾当着记者的面又向孙文平提出:“我想把相机还给周县长,这礼物太贵重了。”孙文平说:“这不仅是周县长给你的礼物,还是政府

给你的奖励。你好好学习,考出好成绩就是最好的回馈。”

打工母亲 再艰苦一年,一家人过团圆年

方治乾生于1993年6月4日,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他3岁那年,父母开始到沿海打工,很少回家。方治乾偶尔在假期才能见他们一面。十几年来,一家人从没有过个团圆年。如今,父母仍在浙江省桐乡市打工。方治乾和哥哥都是罗山高中高二学生。

12岁那年暑假,上初中的方治乾去浙江,总是无意识地对着妈妈喊:“妈!”然后又赶紧补上一句:“不是妈,是妈。”

去年,谢奎娥听到工友说“你没有带过孩子,不知道有多苦”,心里很难受。她给方治乾打电话说:“是我自己没本事,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弄得母子关系像亲戚朋友一样……你要理解。”方治乾说:“我知道,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是你一直在后面默默支持我们。只不过,我们沟通得少一些。”

方治乾从国外回来后,希望妈妈不要再走。但是,妈妈仍然犹豫不决。据谢奎娥介绍,平时两个学生每年花费1.6万元,下一学年上高三,两人估计要花2万元。她不上班,家庭马上就会陷入困境。最后,谢奎娥决定:“再艰苦一年,一家人就过个团圆年。”

方治乾去国外开会,成了小名人。谢奎娥说:“方治乾代表中国出去没有什么是了不起,不是什么大事。在我眼里,这对他学习一点儿帮助都没有。”她担心这件事把儿子的学习落下来,毕竟“咱们是要考试的”。 据《东方今报》

怀孕女囚狱中分娩之后

被判无期徒刑的女罪犯吴琼即将生子,这给她所在的浙江省女子监狱出了难题,按照法律规定,吴琼是重刑犯,不符合监外执行规定。吴琼的状况是中国监狱史上首次遇到。

即使吴生下孩子,谁来抚养?在吴琼家人明确拒绝抚养的情况下,吴琼坚持不放弃孩子抚养权,这意味着只能收留孤儿的福利院也无能为力,而且将来孩子的户口怎么办?监狱将如何破解这两个难题?

怀孕女犯被判无期徒刑

身材瘦小、身怀六甲的吴琼走进浙江省女子监狱。“这是浙江省女子监狱从来没有见过的事。”监狱领导和狱警都愣了。这是2008年12月12日下午。

吴琼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她腹中怀的是被她所杀男友的孩子。今年30岁的吴琼来自贵州山区农村,童年时被伯父母收养,在经历了一次痛苦而失败的婚姻后,两年前,她来到浙江省瑞安市打工。在这个海滨城市,她的人生再一次遭遇了悲剧。

吴琼的同事中有一位叫甘风的男子,英俊而风趣,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对吴琼百般呵护。甘称自己一直未婚,其实他是个有妇之夫。吴琼很快陷入了爱河,两人同居了。

2008年7月,吴琼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把此事当作喜讯告诉甘风,希望他能和自己结婚。甘风却没有高兴,反而要求把孩子打掉。吴琼之前已有过5次流产,还发生过宫外孕,医生曾对她说过,如果再流产就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孩子了。于是,她坚决不肯去做流产。此时,甘风只得告知她有妻室的真相,是不可能和吴琼结婚的。

针对吴琼频频提出结婚的

要求,甘风甚至几次拿刀威胁吴琼:再提结婚,就马上杀了她。最终,被杀的是甘风。那是在一次激烈的争执中,情绪失控的吴琼用刀刺进了甘风的身体。

吴琼被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在等待审判的日子里,贵州老家的亲戚曾到看守所探望吴琼,并劝她把孩子打掉,家里没条件,甘风家更不可能抚养。吴琼拒绝了,她想保住腹中的孩子。

“再怎么也是一条生命啊,会笑,会闹,会长大……”吴琼说自己中专毕业后当过幼儿园老师,看到班里活泼可爱的孩子,当年就不止一次想过,要是哪一天有了自己的孩子,该是多么幸福啊!

2008年11月27日,吴琼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吴琼的服刑,给浙江省监狱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震动。

法律不允许重刑犯监外执行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如果是怀孕的妇女,可以暂予监外执行。但吴琼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重刑犯,不允许监外执行。

“女监从1984年建监以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吴琼这种情况,监狱也没有接生孩子的条件,要将犯人送出去生产,安全

压力很大。而且孩子生下来以后怎么办?虽然国外有女犯在监狱产子并带着孩子服刑的先例,但在国内这方面还是空白。”浙江省女子监狱负责人说。

不仅如此,吴琼生产的费用谁来出?一贫如洗的她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她的家人以及甘风的家人都拒绝支付。

吴琼的情况被上报到浙江省委政法委等上级部门。2008年12月,浙江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专门就吴琼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协商。

“几家单位就吴琼的生产以及孩子的抚养问题约定:产前由女监负责收押,孕期、产期的检查、医疗费用由监狱、瑞安市政府共同承担。”浙江省女子监狱负责人回忆说。

几天后,吴琼住进了监狱安排的一个单独病房,并专门配备了一名妇产科医生。在这间不大的病房里,床单、窗帘被刻意换成粉色,让吴琼感到暖意。

浙江省女子监狱医务室妇产科医生费以琳回忆说:“吴琼来的时候,因为营养不好,身子很虚。怀孕将近7个月的她,甚至看不出肚子有明显的隆起。我们还了解到,她之前有过多次流产以及宫外孕的经历。这些对于一个普通的孕妇来说,都是风险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加倍谨慎。”

作为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费在刚接手这个特殊任务时,心里有些打鼓。对吴琼母子的平安,监狱专门制定了周密的产前保健计划,费以琳定期对她进行产前检查。

吴琼来到女监的第二天,一份专门为她定制的“孕妇餐”就送到了她面前。这个“小灶”一直持续到吴琼产后满月。清早,当费以琳端着牛奶、

鸡蛋、面包走进病房时,吴琼哽咽了。

这个内向的农家女子,在经历了生活磨难后把自己包裹起来,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不信任。入狱后,在监狱民警、费以琳细心的照料和开导下,渐渐有了笑意。

在等待生产的日子里,吴琼除了和狱友们一起做做体操,干一点轻微的活儿外,其余时间都在病房里休息。阳光好的时候,费以琳也会搀着她到操场上晒太阳,聊聊自己3岁孩子的事。吴琼冰封的心慢慢融化了,她开始憧憬未来的生活。

2009年2月23日,吴琼被送往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分娩,剖宫产下一个6斤9两的健康男孩。监狱专门花了3000元请了月子保姆照顾她,并安排女警分成四组,每天24小时轮流陪护在她身边。

在浙江省委政法委等部门的协调下,孩子在出生一周后,瑞安市福利院来人将孩子接去。吴琼冰封的心随狱服刑。

与儿子告别时,吴琼流着泪交给瑞安市福利院工作人员一本《唐诗三百首》,上面有写给孩子的寄语和父母的姓名。她把这本书作为给儿子的第一份礼物,请求福利院工作人员将来把书交给孩子。

女囚坚决不放弃抚养权

按照规定,福利院只能接收孤儿,孩子不可能长期放在福利院。吴琼的孩子若要被福利院接收,前提是吴琼放弃抚养权,否则孩子就没法落户,也没法被合适的家庭收养。

其实,早在吴琼生产之前,浙江省委政法委、省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等部门的负责人专门对吴琼的特殊情况协商时,已有一个方案:吴琼的生产由

浙江省女子监狱负责,孩子由瑞安方带回并负责抚养。

然而,吴琼坚决不愿意放弃抚养权。

吴琼不放弃抚养权,又不可能在监狱里抚养儿子,而远在贵州的家人拒绝接纳孩子。孩子今后的抚养和成长该怎么办?吴琼给监狱出了一个难题。

孩子被送到瑞安市福利院后,该院副院长董海锋率员专程跑到浙江省女子监狱,试图劝说吴琼放弃孩子的抚养权:“福利院的孩子是父母双亡或无法找到的孤儿,从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早期教育考虑,建议她放弃抚养权。因为孩子身体很健康,福利院帮助孩子找个好的家庭应该没问题。”

但此行未能成功。这个外表弱小的女子性格却十分倔强。她一直不言不语,只是不停哭泣。“我不想把孩子给别人!我会好好改造,等出去那天,我要自己照顾我的儿子。”最终,吴琼决绝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她生怕别人抢走她今后一生唯一可以依赖的儿子。

浙江省女子监狱负责人告诉媒体记者,费用还不算是最大的问题。监狱方面打算启动救助基金,可以为吴琼的孩子争取到每年1000元的生活补助,不少狱警也主动为孩子捐款。监狱只是担心孩子没有亲人的关照,会有亲情上的缺失,对以后的成长不太好。

瑞安市政法委积极协调有关方面,决定由公安和民政部门具体落实孩子的户口和抚养问题,政法委提供协助,民政和公安专门为孩子开通了“绿色通道”,特事特办。

“户口落到了我们福利院的集体户口上,这是我们福利院建立以来独一无二的。这样,

这孩子就能和福利院的其他孩子一样,上学、医疗都纳入国家财政经费,享受国家给孤儿的所有补助。”瑞安市福利院副院长董海锋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

得知儿子抚养、户口已有着落,吴琼不禁喜极而泣。前些天,监狱特地派民警去瑞安看望孩子,还为吴琼带来了孩子的照片。吴琼捧着照片,不断地亲吻着,滚落的泪水打湿了照片。

自从儿子出生后,吴琼不止一次地向管教干警询问,如何才能获得减刑?管教干警告诉她,在她服刑满两年后,如果改造表现好,可以启动减刑程序,最少10年后就能出狱。

吴琼的眸子一下亮了起来,她感到自己的生活又充满了阳光。“现在在吴琼学习和劳动比谁都积极,看得出来这个弱小的女子会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一名监狱管教干部说。

女囚也有生育权抚养权

重刑女囚监狱生子之事在浙江省监狱系统传开后,反响十分强烈。法律界人士对此也予以积极肯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咨询部主任张荆律师看来,监狱在无相关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为吴琼生育提供了尽可能的方便,体现了执法部门的人文关怀。在这个案例中,实际上涉及到吴琼在服刑期间的两项权利——生育权和抚养权。

张荆同时指出:尽管吴琼一事最终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但仍需关注的是,就此问题引出的相关法律需尽快完善。毕竟不是每个类似吴琼的服刑罪犯都能获得如此幸运的关怀。而这—问题是需要依靠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